

脸膛

□弋舟



见到时，老吴当真是在“撸起袖子加油干”。江南冬日，正有细雨落下。眼前的这条汉子踩着雨靴忙活，抬头跟我对脸，令我想起“脸膛”这个词。没错，老吴的脸不是“脸庞”，也不是“脸盘”，我只能用“脸膛”称之，硬朗，雄健，胸膛一般地与担当相关联。

沈从文自传中有句子：“表哥是一个紫色脸膛的人，一个守碉堡的战士。”杨朔《潼关之夜》写到：“他的年青而健康的脸膛曾经给我留下一点新鲜的记忆。”郭小川更有诗句：“红人红心红脸膛，红天红地红包钢。”可不，你没法把这些“脸膛”换成“脸庞”或者“脸盘”。

老吴的这张脸膛跟“撸起袖子加油干”真的是匹配。黑，许是淋了雨，黑出了油脂的亮光；硬，额头让人想到“顶牛”这个意思，两颊像是时刻咬着腮帮子。这脸膛有宣传画的效果，宛如被强调和概括了一般，高度凝练，高度典型化。

安顿人陪我在花棚里喝茶，老吴仰着他的脸膛扭身忙活去了。他在指责安装园

泗州戏

□张芬

“五一”放假，带老妈和侄子去奥森广场散步。华灯初上，就听见不远处有一群人围着一个唱戏的女人。简单的伴奏，拖着长线的话筒，女人素颜，热烈，约摸五六十岁，观众多半是附近的民工，他们在她前面围成一个弧形，安静地听。我在她旁边站了一会儿，一瞬间突然意识到，这就是小时候常常听的泗州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逢阴历三月十八，皖北的家乡都有一次庙会。说是庙会，却没有“庙”，只有“会”，以唱戏为主，连唱三天，周围十里八乡的人过来凑热闹赶集。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当天早上，外婆会记得给我五毛钱，于是，从这时起，就没有什么心思学习。当时的数学老师姓黄，70多岁，似乎还保持着私塾先生的某些风范，手里经常拿着自己雕刻着花纹的桃木棍当戒尺，但是那天谁不听课，他也并不体罚，讲课也跟着轻飘飘的。终于要讲到彻底没劲，恩准放假，大家一哄而散。调皮的同学们立刻从灶掉了的塑料布包裹的窗户翻出去，有细心的女同学还不忘挟着一条小板凳。为了能够迅速抵达，我们还跳过学校后面常去捕捉小蝌蚪的长满青草的小河，然后，横穿从翟庄到郑小庄的麦地。彼时麦已如韭，我们一边奔跑一边小心地踩路，那些课本里

◎食话

八宝饭

□刘艳

梁实秋写《八宝饭》，开篇头一句就是“席间一道甜菜八宝饭通常是广受欢迎的”，这句话，历经几十年上百年依然有效，说明什么？纵然时移世易，美食的确是可以拨开历史风尘，真正地与我们相依相伴的。

八宝饭是汉族传统名点，亦是腊八节节日食俗，流行于全国各地，因其主料是糯米，南方人喜食，尤盛于江南。至于何为八宝？各地配方各异，但主料基本都是白糯米饭拌以白糖和油，有的地方还拌以桂花。碗底铺以红枣、莲子、桂圆、各种蜜饯，上面填以事先搅拌均匀的糯米饭，有的人会在糯米饭里填埋红豆沙，满满一碗。蒸熟后将其倒扣在盘里，香甜的人，甚至更在上面浇以糖卤汁，令其香甜更上一层楼，方才称心快意。

如今八宝饭，已不限于腊八节，很多喜庆的场合，尤其是年节，几乎是必出现的一道甜点，有人当它是甜菜，有人视其为主食，是菜也好主食也罢，老少咸宜是一定的。上海人更是把它视为年夜饭上的一道压轴甜点，寓意也好，象征着一家人团圆圆圆、甜甜蜜蜜，来年大吉大利、老人健康长寿等吉祥寓意。以一份正宗的上

区电路的施工者，大概意思是认为“布线不美观”，“尽管不影响质量，但接头不美就不能算达标”。我在身后打量这人，撸起袖子的外套和挽起裤管的西裤，质地都不错，被他这么撸起和挽起，倒是很实用，但跟“美观”没什么关系——即便不撸不挽，似乎也搭配得不甚协调。主要是和他的那张脸膛不协调，你没法想象一身阿玛尼配上一张“大干快上的”的脸膛。

再对脸，已经是在饭桌上。饭桌支在门房里，老吴的几个弟子围桌共餐。其中一个负责盛饭，递到我手里，却遭到了批评。老吴严肃地指出：怎么能给客人盛进锅巴呢？盛饭时，怎么能先不把饭团压松散呢？几位年轻人是老吴的员工，他却师父似的言传身教，从盛饭这样的细节上教导着自己的员工。于是，员工就成为了弟子。老吴健谈，说得兴起，回身摸出瓶红酒。这酒似乎有些来路，一位女弟子遵命倒酒，老吴隔空比划，“结束的时候要转一下手腕”，同时双手配合着演示那“转一下手腕”的微妙拿捏。于是便传授起了红酒的礼仪。

如此做派，对应着那样的一张脸膛，我竟没有觉出违和。一切似乎天经地义。“锅巴”与“红酒”共享的礼仪，朴素的东方道理与讲究的西方规矩，一并挤在逼仄的门房里，混合成了极具说服力的气场。

前一天，有人已经对我聊起过老吴的经历，现在，炖菜佐着红酒，我开始印证这个人的传奇。

当年，他去温州修表，继而学了修车，一番打拼，却两手空空回了家乡。这里面的变故不去说，只说，变故之后，跟

爱护草木的道德文章早已抛诸脑后，好在麦苗并不气馁，之后照旧坚韧不拔，在夏天开花结籽。

戏台一般设在打麦场，土地空旷，背后屋舍俨然。唱起来之后，就渐渐响天动地，花团锦簇。树上、石头上、椅子上、屋顶上全是人，我人小看不见，两毛先买烧饼，另外三毛放在贴身口袋里，并时常用手检视：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有点余裕可是和别人在这种场合交流时的底气。于是，像《老残游记》中的主人公那样，我啃着烧饼，无所事事，先爬到后台看人换妆。那些演员，有的在对着镜子化妆，有的则在一边休息，脸上的妆容如同已经休歇的面具，“面具”后懒散的眼神显得异常忧郁吓人。那些跑龙套拿着马鞭的化了妆的小孩，在后台幕布边等候，则愿意用画得面目全非的滴滴溜的眼睛看我们，似乎想和我们热情交流，但又露出某种羞涩与不屑的优越感。鉴于后者也有公事在身，后台也玩腻了，就到处跑。

我常常会在人群中看到村子里的熟人。邻家毛省也来了，她那时候已经是十五六岁的少女，开春的时候刚用冰凌扎了耳朵眼，戴了红色的大耳环，脸上抹着厚厚的粉，因为不常洗澡，显得脖子更加黑黢黢。但我并不是因为这个才不太喜欢

他一同返乡的，就是今天的温州妻子。家乡号称陶都，妻子发现做壶的利润惊人，便转了行。老吴还修着他的车。黑脸汉子惊人的心灵手巧，他修车的本事建立在拆车上，拆透了，也就把车琢磨透了。完全是土把式，但自有一套赢人的手艺。直到今天，自家的车有了毛病，他都是自己动手拾掇，配件都能上车床自己加工；他个矮，几十万元的哈雷摩托跨上去，脚挨不着油门，于是自己动手，硬是降低了车身的高度。妻子做壶，他没事儿会瞅一眼，瞅着瞅着就在旁边指点：这个壶盖有问题，这个壶嘴不流畅。说得多了，干脆自己上手，一上手，居然就有点儿模样。别人做壶老老实实，一切按既有的规矩来，他“不老实”，从资料上了解到明清时福建某地有使用紫砂壶的习俗，带着现金就奔了过去，干嘛？收老壶，回来琢磨款式，琢磨工艺。于是不修车了，摇身一变，就成了新生计里的行家里手。他做事执拗，甚至有点儿偏执型人格，赚钱当然是目的，但他看上去常常是把手里的活做到极致当成了目的。手工做壶，他能十几个小时不挪窝，较的是艺术家一样的劲儿。妻子心疼了，给小院里搬进几盆绿植，为的是能让他起来走两步，眼里有点儿绿色，也是个调剂。几盆绿植开了花，那香气竟让他觉得莫名对路，注意力从壶上就挪开了。背着手去了花卉市场，想再弄几盆回来，指着眼熟的几盆询价，人家老板挥手赶他走：这不是你养的，看看别的吧。黑脸膛的汉子太自尊，一气之下，把看中的全买了。那真是个天价。由是，他也第一次知道了一种植物的名字——兰花。

她，当时全村只有她家有电视，她偏爱外国译制片，情情爱爱，不打也不闹，我和村里其他小朋友每每要握住呼吸等她看完外国片，才能看令人振奋的《雪山飞狐》，所以，我就躲她远远的。当然，大多数情况下，碰到村子里其他的小伙伴，例如勇敢和麻坡兄弟，就相视一笑，有一种人生何处不相逢的喜悦，甚至还有点害羞。外公也来了，正在不远处的石头上蹲着，似乎对戏文已经很熟，和别的老人一边抽着烟袋一边议论。有时候，他手里拿着草节在石头上比划来去，很显然，他们是在谈别的更重要的事情。我又踮起脚跟看看舞台，只能看到男人或者女人头上的野鸡毛晃来晃去。耳边，是男人高亢而悲怆据理力争恶声恶气颤抖大吼声，女人则唱另一种风味、嘹亮欢快，有时还连带着哼唧嗨嗨的哀啼，后来，在村里别人的丧礼上，见过当事人的儿媳这样类似长哭当歌过。台下大多数观众都很振奋，放心地观望着这公开的别人的故事，显出一种令人满足的安静。

还记得当时戏班里有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每年都来唱，颇得外公青睐，每次听完，回村里跟人议论，一向低调内向的他都自告奋勇地插嘴说：卫生鱼儿（名的声）这个娘们儿真丧！（“丧”字是我们

炖菜、红酒，在老吴的方式里，我听不到他对往事的自白，但置身在他的地盘，看着他指点弟子们做人、品酒，我内心某些先人为主的观念却在被矫正。不，这个人不是一个“传奇”，他生命的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每一步，都踩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点子上。“我是一个农民”，这几乎就是他的口头禅，说一段就会来上这么一句。这句口头禅跟他的那张脸膛吻合极了，就像那张脸膛跟“撸起袖子加油干”吻合极了一样。

这个“农民”，如今拥有一家名为“陶都国兰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企业，占地面积100多亩，总投资近亿元，而他本人，被称为“兰界正能量”。

兰花，脸膛，这两组在我内心里有着不同意象的符号，在炖菜和红酒的搭配中，奇妙地叠加。这便是我们所在时代的真实况味，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感受和想象力，从来没有今天这般的复杂，这般的生气勃勃。老吴这个农民，“撸起袖子加油干”了30多年，今天的他，以一种“中国富豪”的形象，有力地证明了财富的积累并不必然笼罩着“原罪”。他的那张脸膛，纠正着我的狭隘，原来，当我们想象一个成功者的时候，并非一定是“小时代”里香车宝马的镜头，那也可以是一幅“大干快上”的画面；“原罪”也不是我们进步的捷径，“我是一个农民”这样的老吴们，才是一步一步走出今天中国道路的真正主角。

这或许才是真实的中国，是千千万万张脸膛较劲儿而努力积累而成的中国。这是中国的脸膛。



的土话，是指人很泼辣很厉害的样子。）而在我的印象里，“卫生鱼儿”的形象已然模糊，只记得有一次，太阳落山，戏台休歇，人群渐渐散去，看到她出现在舞台一角，身材魁梧，脸上还带着妆，与人一边聊天一边抽烟，突然一呼噜嗓子，咳嗽起来，朝身后吐了一口痰。呜呼！然而，我相信外公一定有他的道理。

后来，我因为求学，离开了村庄，再也没有去过“三月十八会”，也不知道这没有“庙”的“会”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偶尔在电视机或者录音机里听到泗州戏，对其中的悲愤、欢快、泼辣、热烈有了一点体会，似乎也明白为什么又被叫作“拉魂腔”。工作后，有一次回老家，看到村头有一个唱卡拉OK的小货车，里面没有人，放着很大的音响设备，播放着流行歌曲的伴奏，车灯上还挂着红绸子。一时间让人想起费里尼电影里流动的歌舞队或马戏团。但那次匆匆离开，并未亲见家乡文艺生活的变迁。近几年，征地拆迁，老家的亲戚都住进了新农村的大洋楼，卡拉OK队不见了，更没有机会看到露天麦场上的泗州戏班了，当然，也再提一睹“卫生鱼儿”阿姨不带妆的神采的愿望了。



民瞧掉小虎，有鱼盐枣栗之饶”、“燕、秦干树栗”“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的记载。我用的是自己煮后炒制的怀柔板栗，剥仁备用。也有市售袋装即食的怀柔板栗仁可用。

所有食材齐备，浅碗不宜做出多层的八宝饭，所以取一较深的碗，我用的是“美千代”日式料理的深碗，碗内壁均匀抹一层橄榄油，防其沾碗和八宝饭不易成型。把红枣莲子桂圆肉枸杞子葡萄干等铺在碗底，填入白糯米饭，压实。然后将碗底所用的“八宝”再铺一层，沿碗壁摆一圈板栗仁，然后再铺一层紫糯米饭，边填边压，压平，上屉去蒸，使碗中先还是生的食材熟透，并与糯米饭融为一体。待上桌，取一大盘，最好是日式料理的那种大盘子，直径总有二十六七厘米的那种盘子，方便配型摆盘和取食。把碗里蒸好的八宝饭倒扣在大盘上，盘中事先铺好鲜果切片也是可以。如果有人喜甜，对甜食不须忌口的话，旁边备碟糖桂花，随需取用，或蘸或浇，皆无不可。这样一份八宝饭，色香味型俱佳，又可以省却冒着高糖高油高盐美食的风险，总可以满足家里每个人的不同需求。



长途汽车司机之梦

□刘大先

常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关于梦想的表达，那些怀揣着各式各样欲求的人们，如同身负珍宝、手握利剑的勇士，背井离乡，披荆斩棘，走在追梦的行程之中，他们充满干劲，脸庞因为内在梦想的激励而熠熠生辉，哪怕两手空空，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挫折与沮丧，也不曾损伤丝毫。那个最初的梦想被信念加持，似乎带上了无坚不摧的力量，鼓舞着失意与抑郁中的人们毅然决然地不再回头。

在我那闭塞晦暗的少年时代，也曾经有过一个梦想，那就是做一名长途汽车司机。开着巨大的货车奔驰在开阔无比、遥无止境的道路，远方的景物如同多彩的卷轴次第展开，陌生的生活与奇遇遥遥在望，夜里住宿在高速公路边的野店，第二天清晨醒来，可以看到窗外阳光明媚，树叶苍翠欲滴，不知名的鸟儿在窗台静静地凝视枝头的露珠。我的内心会充实又宁静，像一颗饱满的浆果。

这一切源自于一个对外部世界毫无所知的皖西少年的想往，因为那时候我连火车也没有见过，触目所及不过是崎岖不平的土地与懵懂无知的乡民。封闭的环境反倒激发出单纯而恣肆的想象，它是如此的有力，以至于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就与一起长大的发小踏上了单车旅行。我们都是生命力旺盛，不甘心困守在这一方狭窄天地的小孩。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格瓦拉和朋友阿尔贝托骑着摩托车在南美丛林中漫游的经历，他们一开始想象“前方犹如聂鲁达的爱情诗般美好”，到最后经历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夜晚”，因而发现人间的苦难与社会的不公，从而加入了后来的古巴革命。但对我们而言，那时候一切不过是青春的冲动。

我们决定沿着312国道，去住金寨燕子河，发小喜欢的女孩子就住在那里。砂石的公路在车轮下滋滋作响，天空高远湛蓝，白杨树一动不动。我们在烈日下骑着单车，完全不去想三百里的路程以及不明就里的远方女孩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这次旅行和爱情半途而废，但我们都相信自己不可能一辈子都窝在封闭的偏僻乡村。许多年之后，我出国回来，遇到一位邻居大婶，她好奇又略带羞涩地问我，美国有没有和我们老家一样的树，那里的人是不是都头朝下走路——在她从电视或其他渠道得来的七零八落的知识中，知道美国在地球的另一边，是与我们反着的，所以理所当然与我们脚底朝，倒着来的。乡村是迟滞的。但是1994夏天的单车之旅，让世界向我们打开，哪怕只是世界的一角，它也再不可能是邻居大婶头脑中那个样子了。我们发泄心中的狂野，一起去老沙河边的丛林中用火铳捕猎翅膀硕大的水鸟，看到白鹳翩翩飞过柳林上空，想象天空中俯视山野的横样。高中时候，发小不想读书，离家出走，一个月后，他才从杭州回来，带回了江南城市的消息。这个青春中莫名所以的无因反抗，现在想起来如同没有逻辑的剧情，只有激烈蓬勃的热情。

18岁第一次出远门，是在高考过后，我和发小搭长途汽车去上海打工。那时候，他已经从职业技术学校毕业，没有工作，而我觉得自己考不上大学。经过一夜的颠簸，第二天下午在闵行一个叫做纪王的小镇下车，两眼一抹黑，车站的板壁上贴着因风雨剥蚀破碎的电影海报。一路问，从纪王转七宝，从七宝到莘庄，公交车晃晃悠悠，身体却一直也不觉得疲倦。从西渡乘轮渡过黄浦江的时候，已是暮色时分，我记不得江水浑浩浩荡，暗流汹涌，有如两个少年躁动不安的心。

20年过去，我再也没去过纪王，但地铁已经开到了七宝，而黄浦江上架起了数个桥梁，再也不需要等半天才看见慢吞吞的轮渡了。在这漫长又短暂的20年里，少时的朋友星散，都离开了家乡。发小在苏州做粮油生意，日子过得颇为小康，而我则到了北京。这中间彼此经历了多少艰苦、曲折、辛酸乃至屈辱，在后来见面时都没有聊起过。我们一起驱车去丹阳、无锡、江阴漫游，这里是我们少年时代向往的富庶繁华之地。有一天夜里在张家港开发区的中心吃夜宵，要了几瓶啤酒慢慢喝。旁边桌上是几个刚刚工作的年轻人高谈阔论，我就想到少年时候一起去上海的情形。长江边上的夜风很大，将浩渺的心事都吹散了。他说，还记得小时候你想做长途汽车司机吗？我只会咯咯地笑。

我们内心里都很清楚，那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理想形象是经过戏剧化的抛光，成为一枚示范性的奖章，只为成功者而颁发，失败者则无缘得见梦想中花朵的绽放。大多数时候，人们以为自己逆流而上、击水三千，事实上不过是在更为广阔与绵长的生命之河中随波逐流。日常生活的琐碎与重压，会碾压不切实际的幻想，即便是奔赴在方向与目标明确的道路之上，也如同无限汪洋中的一叶孤舟，在命运颠簸不定的惊涛骇浪里被迫改变航向。

我自然没有做成长途汽车司机，就像他也没有与那个燕子河女孩成为恋人，但这也并没有构成某个遗憾，就算没有长途汽车，也同样能够脚踏大地，走过异乡的道路，入眼别样的繁花。在剧烈变迁的宏大世界之中，我们这些出身底层的孩子能够把握的只有自己，那笃定的、勇往直前的、永远年轻的自己。命运的波浪载浮载沉，航行在大海上的小船也许暂时失去方向，最初那个长途汽车之梦也许烟消云散，但它终究会幻化成一座内心的灯塔，在狂风暴雨中赋予我们摩西剖开红海般的力量，最终风平浪静，一切安祥顺遂，如入波澜不起而静谧深邃的平湖。